



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： 在历史数据库里检索战“疫”之方

自人类诞生以来,疫病就成了人类的影子,哪里有人类,哪里就会有疾病。医学进步、社会发展的同时,疫病也在不断进化,变着花样偷袭人类的尝试日渐频繁。

鉴古而知今,从历史沙海中筛出来的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,就像一个疫灾数据库。当开启检索模式时,疫灾的规律便会逐渐浮现,人们应对疫灾便可更加从容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

为疫灾记录“拼图”

唐诗是唐朝社会的大百科全书。从唐诗里寻找古人的蛛丝马迹,为历史“拼图”,成为近代学者屡试不爽的研究方法。

30年前,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龚胜生还是个研究生,正师从历史地理学名家史念海先生,进行唐史方面的研究。当时,他由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想到,柴是古人必不可少的生活能源,那么唐代首都长安城里的薪炭供销就是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,唐诗里很可能有更多线索。

于是,他便想知道《全唐诗》中,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描述终南山樵采和长安城贩薪的诗篇。结果,相关题材的唐诗没有找到,一个“瘴”字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杜甫有“春生南国瘴,气待北风苏”,白居易有“瘴地难为老,蛮陬不易驯”,王维有“青草瘴时过夏口,白头浪里出渝城”,韩愈有“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”,柳宗元有“瘴病犹灵府,日与往昔殊”……根据龚胜生的统计,《全唐诗》中,乌烟瘴气的“瘴”字反复出现了376次。

他便将《全唐诗》中所有含“瘴”的诗句摘录出来,然后根据诗句的内容确定其描绘的地点,进而用地理学的方法,绘制出了一幅唐代“瘴地”空间分布图。

经过进一步查阅历史文献,龚胜生知道了中国古籍所谓的“瘴”主要是指恶性疟疾,而“瘴地”就是恶性疟疾流行之地。于是,他又在更漫长的时间维度里去思考这个问题,最终对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瘴病的分布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。

这次尝试后,龚胜生又带领团队,用20年做了一件大事。

2019年12月,齐鲁书社出版的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首发式举行。这是一部280万字的皇皇巨著,包括“先秦至明代卷”“清代卷”“民国卷(上)”“民国卷(下)”“畜疫卷”,以编年体的方式,分年度、分地域辑录了我国自西周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2700余年的疫灾史料。

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疫灾的防治,有丰富的疫灾记录史,形成了世界上最长的疫灾时间序列。除正史、档案、实录、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,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还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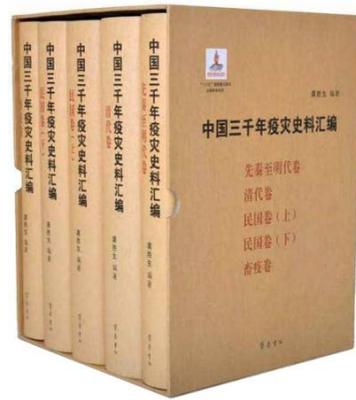
除尽量保持史料原文风格外,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尽可能摘录疫时、疫域、疫因、疫果、疫情、疫种等信息,是迄今为止中国疫灾最详备的史料汇编,填补了我国一直没有专门、系统、全面的疫灾史料汇编的空白。

防疫重点在于人

对于“疫”字,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是“民皆病”,也就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。一旦这种病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开来,就会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,所以疫病也就成了疫灾。

正所谓“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”,受自然和社会条件影响,不同区域往往存在一些高发的疫灾,对历史上的各种疫灾进行摸底式排查,便能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奥秘。

如果用更现代的眼光来看,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就是一个疫灾数据库,通过大数据分析,可以从中读出人口发展、灾害、医学、经济、环境等方



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
龚胜生 编著
齐鲁书社

面的很多信息。

比如瘴病,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,并且主要发生在气候湿热的区域和时节。龚胜生研究发现,战国西汉时期,瘴病在秦岭、淮河以南广大区域流行;隋唐五代时期,瘴病在大巴山、长江以南区域流行;明清时期,瘴病主要在南岭山地流行;时至今日,瘴病流行区域已经退居至云南西南部一带。

因此,早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,越往南,瘴害越严重,土地开发也越晚。而瘴病不断南退,又反映出这两千多年来中国气候的变化趋势。

瘴病只是众多疫病的一种。根据龚胜生的统计,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720年间,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,也就是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,而且越来越多。特别是北宋至今,疫灾频发,是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第二个疫灾高峰期。

通过长期对中国疫灾发展情况的研究,他从中找到了一些规律,这对今天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,仍有参考意义。

疫灾和水灾、旱灾、蝗灾一样,当对人类造成影响时,才称得上是“灾”,受到人类关注。因此,自古以来,城市疫灾要多于乡村,京畿是疫灾多发区。

中国古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,城乡之间不仅人们活动方式不同,而且致病环境也有明显差异。农村人口密度低,流动人口少,生产和生活的空间集聚程度不高,一般不易流行大规模的疫病。城市则正好相反,不仅人类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较高,而且还容易会集外来流动人口。

同时,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城市,由于人口规模扩大,生活垃圾增多,水源污染日趋严重,环境的致病能力也在增强。这样,城市往往成为疫病的多发点。周秦西汉的长安,东汉的洛阳,魏晋南北朝的长安、洛阳、建康,唐朝的长安、洛阳,宋金的开封,南宋的杭州,元明清的北京,都曾是疫灾的重灾区。

这种基于历史地理学的判断,与现代医学研究是一致的。如今,人们已经知道瘟疫流行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:致病力较强的病原体、足够数量的易感人群、有利的疫病传播途径。其中,易感人群和传播途径都受人口密度影响。那些开发程度强,人口密度、城市化率、交通密度高,贸易和交往频繁的地区,往往是疫病的高发地。由此,龚胜生建议,疫病防控的重点要放在城市地区,集中有限的防疫资源,重点做好县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防控。

人口流动堪称疫病流行的“加速器”,便利的交通使现代疫情防控疫情面临空前挑战。不过,龚胜生认为,汽车、火车、飞机、轮船等各类交通工具并不是传播疫病的载体,交通管控的对象是流动的人口,而非交通工具和道路本

身。加强流动人口管控,不必以交通线路的破坏为代价。

不断织密的防护网

医学日益进步,但是从数据上看,疫灾“捣乱”反而越来越频繁,并变得越来越“狡猾”。比如1820年以前,天花、鼠疫多单独流行,1820年以后,天花、鼠疫和霍乱汇流,三大烈性传染病轮番攻击。这一切,似乎陷入了怪圈,让“万物之主”的现代人很难接受。

龚胜生认为,人口密度不断提高,人员的流动性不断加强,近代以来,疫病的流行确实越来越容易。另外,生产力提高后,人类对自然的干扰越来越深入,使得疫病的致病力越来越强,疫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。

不过,在他看来,“疫灾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作用的结果,疫灾就像是人类的影子”。因此,人们也没有必要谈“疫”色变,过度恐惧。

疫病在进化,人类也在进化,人类医学进步的历史,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疫灾不断斗争并战胜疫灾的历史。东汉名医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名号可谓家喻户晓,而张仲景所说的伤寒,并非常见的伤风感冒,而是瘟疫。

东汉末年,长江以北地区暴发瘟疫,死亡人数多达2000多万。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败,除了周瑜用火攻之计外,也与当时曹军军中瘟疫横行有关。蜚声文坛的建安七子,除了孔融、阮瑀早亡外,其他五位诗人均死于这场大瘟疫。

当时,人们对于瘟疫的防治,还处在迷信阶段。一有瘟疫,专业的驱鬼人“掌蒙熊皮,黄金四目,玄衣朱裳,执戈扬盾”,连跳带唱故弄玄虚,结果不仅耽误了病人的治疗,还因民众看热闹聚集,加速了瘟疫的传播。

针对“亡者三分之二,伤寒十居其七”的情况,张仲景潜心钻研,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。他对伤寒病人的症状,发明了一种“驱寒解耳汤”,把辣椒和羊肉及发热驱寒的药物,用面皮包起来,煮熟之后给病人吃下,开“饺子”之先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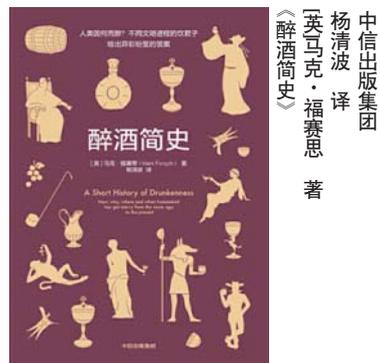
面对升级换代的疫情,老药方未必总是管用,这就倒逼医学有新探索。

明朝末年,一场大规模瘟疫再次席卷中国,“一巷百余家,无一家仅免,一门数十口,无一仅存者”。那时,人们对瘟疫还缺乏认知,仍是根据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来诊断,却药不对症,导致“枉死者不可胜记”。名医吴又可潜心研究,依据治验所得,撰写成了《瘟疫论》一书,创立了瘟疫学说,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。

“我们在看到其巨大破坏性的同时,也要看到疫灾冲击下,所激发的人与社会的创造力。”龚胜生说,早在秦代,湖北就有“厉迁所”的设置,清代东北也有“避痘所”的设置,隔离传染源历来都是控制疫病流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手段。中国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传染病医院“中国传染病医院”,就是疫灾流行激发的产物。

疫病来袭并不可怕,关键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,不断织密疫病的防护网。两千多年来,每逢疫灾大规模流行,政府、民间积极应对,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、政府防疫制度的完善。同时,全民战“疫”的过程,也是民间防疫习俗形成以及公众卫生意识养成的过程。

“伐乱,伐疾,伐疫,武之顺也。”回顾中国的疫灾流行史,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,为现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决策咨询。鉴古而知今,这也正是龚胜生带领团队编纂《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》,研究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现实意义所在。



中信出版集团
杨清波 译
【英】马克·福塞思 著
《醉酒简史》

全球史视野下的 醉酒现象

□ 尧云飞

“酒后吐真言”,这句话背后藏着什么秘密?为什么真心话在酒后才能诉说?说话的人是真醉了,还是假装喝醉?拼命劝人喝酒的酒桌文化真的是中国特色吗?在英国人马克·福塞思的《醉酒简史》中,世界各地的醉酒现象不断上演,与人类文明史交相辉映。最具智慧的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是饮酒爱好者,文献中却从未见他们喝醉过。柏拉图借助饮酒的会场,记录下经典的《会饮篇》,可见他在酒局里的清醒。莫卧儿帝国创始人巴布尔的日记记载他微服私访山野外喝酒,遇到加入豪饮的女人安妮卡,为了将她摆脱,巴布尔假装不省人事,倒在地上,成功骗过了她。

嗜酒的俄罗斯人并非什么时候都想狂喝一通,故而他们的劝酒伎俩丝毫不逊于中国。在16世纪50年代神圣罗马帝国驻俄大使笔下,如果嘉宾们拒绝喝酒,俄罗斯宫廷的劝酒大师就站出来,高声提议为俄罗斯大公和其他贵族的健康、幸福和胜利干杯。在这种祭出权力的话语胁迫下,在场的人只好随之饮而尽,直至喝醉。醉酒还是俄罗斯君主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,彼得大帝、伊凡四世等人均曾娴熟运用。沙皇伊凡四世喜欢命令下属一杯杯喝下去,直喝到昏迷或者精神错乱。如果有人恳求不想再喝,伊凡四世的近臣就会当场对沙皇说:“陛下。就是他,不想在您的宴会上尽兴,似乎他在谴责、蔑视陛下您和我们,笑话我们是酒鬼,但他自己却假惺惺装得很正义的样子。”面对残暴的伊凡四世,宴会上的人们只能喝到意识模糊。俄罗斯的劝酒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也早早登场。夏朝末代君主桀和他的宠妃妹喜,就曾建造酒池供其享乐,但妹喜很快厌倦,于是命令3000人将酒池喝干。看着这些人醉死、淹死其中,她感到无比快乐。

从苏美尔人的酒馆到罗马人共同的盛宴,再到中世纪的啤酒,十九世纪澳大利亚的朗姆酒,《醉酒简史》以精炼的笔法揭示人类饮酒文化的变迁。从《圣经》里的酒故事到中国儒家经典的《酒诰》,《醉酒简史》又将不同文明的饮酒文化做了粗线条的比较。正是这种宏阔的全球史视角,令这本轻松的小书具有学术史和写作史的意义。我们已经阅读过许多中国文人与美酒的故事,阮籍的大醉、李白的痛饮狂歌、宋江的浔阳楼醉酒题诗等等,都是耳熟能详的篇章,然而,放在世界各地文明的对照中,中国人的饮酒究竟有何特点呢?《醉酒简史》描绘的醉酒常常伴随着呕吐与性,在中国或稍有不同,李白“笑入胡姬酒肆中”或许也有些香艳,但他醉后可能更爱写诗,更爱捉月。只有在通俗的《卖油郎独占花魁娘》中,我们才能注意到美女的呕吐物以及中国男性的一如既往矜持。比照不同文明中的醉酒现象,是可以发现我们民族含蓄、优雅的一面,然而也能发现我们文化里自我压抑的一面,自然,也可掘出和俄罗斯一样令人厌恶的劝酒文化。

以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说:“历史是最受欢迎的写作类型,因为它适应最高到最低的才能。”可惜中国的史家往往放弃通俗写作的才能,斤斤于高深的学术的历史学研究,而太不注意日常生活,尤其是与其他文明和国度作比较。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热潮提醒我们,人类的七情六欲是共通的,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更可以作横向的比较。在醉酒的背后,习俗、宗教、制度、社会组织和文化生态的千变万化超乎想象。重要的是,不仅关注我们的醉酒,如魏晋名士和酒这样古老的问题,还要把眼光放大,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干了什么。正如《醉酒简史》开篇所言,“酒神与自然法则同在。”中西酒神作用下的人们当然也能互相交流。